

文艺批评话语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

黄 擎◎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批评话语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

黄
擎◎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 世纪 40—70 年代/黄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004-9924-4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批评-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4478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立项课题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浙江大学一流基础学科建设计划资助项目

丛书总序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前身是 1897 年创办的求是书院。百年浙大，一路风雨又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当时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 1920 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 1928 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嗣后 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杭大中文系”的系名，一叫便是整整四十年，并已在社会和学界赢得良好的声誉。直到 1998 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经历了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又返回到了它的母体怀抱。

现在的浙大中文系是以原杭大中文系为主体的，自然，它也整合了其他相关的师资力量。

浙大中文系建系以来，人才辈出，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祝文白、缪钺、刘大白、丰子恺、许钦文、夏承焘、姜亮夫、钱南扬、胡士莹、徐声越、陆维钊、任铭善、王季思、郑奠、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杏坛名师、学术名流都曾于此任教。他们实践的“传承创造”的学术精神和追求的“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为中文系的发展，包括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的创建，也包括有特色、有发展后劲的梯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年沧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薪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回顾往昔，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竺可桢老校长在20世纪40年代所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愈发怀念为中文系发展作出贡献的诸多前辈和老师，并油然而萌生了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文系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几代人共同不懈的努力，浙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在国内很具声誉和影响的系科。特别是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以来，更是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同类专业的高校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中文系也由原先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由汉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三个本科专业和一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元、结构合理的“大中文”专业。目前，中文系已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七个二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四个学科为浙江省省级重点学科。汉语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有在编教师50人，其中教授26人（博士生导师25人），副教授14人。他们不仅在各个学科发挥重要的带头和骨干作用，而且在国内学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这批以四五十岁的中青年学者为

主体的学术核心的努力和引领下，由夏承焘、姜亮夫等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吴熊和、王元骧等名师宿儒所光大的中文系学脉，方能做到承传有自、薪火绵延。

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钱江新潮文丛》，所收的是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在职教师的系列学术论著。他们中有三十多岁的学术新锐，也有五六十岁的年长或较年长一代学者。涉及的范围，包括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影视文学等不同学科。在这里，学科与学科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是有差异的，思维理念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努力追求和体现中文系传统的“求是博雅”学风。章学诚评价古代两浙学风时曾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大中文系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为非求是则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这反映了我们力图贯通浙东西、融合古与今的学术视野与意识，以及从传统的学脉中创造新的浙江学派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观的一个投影和富有理性的特殊呈现。尽管面对浙大中文系的百年历史和悠久传统，本丛书中的这些成果尚远不能说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这方面，我们深知与前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中文系数十位教师用心血和智慧浇灌出来的这些学术之果，毕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求是博雅”做了新的诠释，这是很可欣喜的。它不妨可看做是对中文系近十年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验，一次富有意味的“集体亮相”。

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不端行为也屡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文系老师“守正创新”，既一方面继承百年来的优良学术传统，不盲从、不浮躁，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学风，孜孜不倦地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坚守着学术正道；另一方面又不囿陈说，锐意创新，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为学术研究作出属于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这就十分难能可贵。而这一点，在这套丛书中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不尚空谈，不发虚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想，这就是浙

大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得点”。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弘扬浙大中文系这一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为提升和扩大其学术水平及影响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文系 84 届校友、浙江通策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明先生的鼎力相助。2007 年 5 月，在浙江大学 110 周年校庆期间，他慷慨捐资百万元支持中文学科建设。他的善举和情谊令人感佩，也催发了我们策划并编纂此书的积极性。缘于此，我不仅对本丛书所反映的教师学术才华和追求感到欣慰，同时更对百年浙大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持一份坚定的信心。

钱潮天下奇观，故孙中山先生有“猛进如潮”之赞，学术创新，贵如潮水之猛进荡决；钱潮及期而信，故吴越王钱镠有“日夜波涛不暂息”之感，学脉传承，当如潮水之永不止息。“求是博雅”，就意味着学者既要有弄潮儿那般“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的锐气，也要有“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的心境。本丛书以“钱江新潮”为名，其微意实在于此。

吴秀明

2009 年 4 月 15 日于浙江大学

序

陈思和

我已经记不清是 2003 年还是 2004 年，我去杭州，那时姚晓雷刚刚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任教席，同时他又在浙江大学跟随吴秀明教授从事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工作。一天他引了黄擎来看我，大约黄擎那时还刚刚毕业留校，看上去非常年轻活泼，说话充满活力。她提出申请去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并希望我担任她的联系导师，我问了她的研究方向时，她回答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并且一直在关注当代文艺批评方面的现象。黄擎在浙江大学文学学院的教师岗位属于文艺学学科的，所以有意向文艺理论领域靠近。我对于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学生选择自己研究方向，不趋时尚而偏取这样沉重、无趣又有很多限制的题目来研究，不由得刮目相看。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期以后黄擎进入复旦中文的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题目是《毛语体时代的文艺批评话语研究》，也就是现在即将正式出版的《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 世纪 40—70 年代》一书的初稿。

我曾在文贵良博士的著作《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一书的序言里写过这样一段话：“这部书稿的小标题设定为：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贵良抓住战争对人们文化心理的影响，分析话语的嬗变和更新，我觉得是抓得很准的。战争改变了一切，新的政治话语主体在战争实践中得到了确立，民间大众的话语因为战争获得了关注和利用，而知识者的启蒙话语则在战争中面对了考验和

挑战。三套权力系列话语在这一历史时刻碰撞上了，迸发了耀眼的火花，三方都以极致的形态表达出来。事实上，战争在人们思维上的影响所及，远不止这十一年间，而是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的建设时期，甚至延续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战争思维是一个长期的文化现象，它会从长期形成的话语中体现出来，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优势和弊端也都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显现。所以，仅仅是战争动乱时期的话语现象，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话语考察和描述。……贵良的话语研究还是初步的，必须把他的研究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视野里加以考察，才可能发现真正属于话语研究自身的规律，而因此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既定看法。”贵良的研究范围是1937—1949年，指整个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的话语演变特点，但我想说的是，仅仅以战争期间为界限来研究战争话语的规律，还是很不够的，因为战争对人们思维的影响和改造并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它会在战争结束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发生作用，并且生发出新的语言特点。黄擎的研究正好是衔接着贵良的课题，贵良研究战争环境下三种话语系统——新的革命战争话语、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的消长和变化，而黄擎则研究从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文艺批评的话语特征，她把战争期间的三种话语系统归纳为一种话语形态，并且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即“毛语体时代”的主流批评话语。这个归纳的内涵非常清楚：在1942年以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发展为独尊一家的话语权力，而其他两种话语系统都处于被压抑被遮蔽的形态下，主流的文艺批评话语只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产物，或者进一步成为阶级斗争理论掩盖下的党内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的有力工具。这样一个趋势，从战争结束、新政权建立以后愈演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是一部研究时代与语言关系的著作。在我看来，在时代与语言之间还有一个元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思维模式。我说的不是个别人的思维特点，而是作为时代风格的思维特征，这种思维特征是指主流意识形态与被统治的民众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表现出来的某种惊人的一致性。我把它称之为文化心理。1949年以后的中国虽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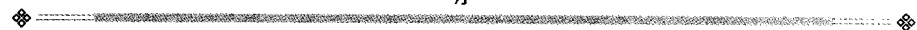
是长期的战争环境造成的某种文化心理仍然发生着作用，它形成了特定的战争文化心理，进而影响了语言。黄肇和许多研究者都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作为“毛语体时代”，黄肇在书中还详细说明了毛泽东本人富有个性魅力的语言特征是从何时开始在全党、全国获得了统治地位，并且被普及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思维模式。事实上，毛泽东的思维特征正是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同时又依赖于战争使他的那种以个人命名的思维特征被全党全民族所接受，时代造就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又统帅、甚而影响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心理，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语体”。文艺批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艺思想的体现，其语体风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战争思维模式。

如何来把握毛泽东本人的有个人魅力的语言特征以及这种语言特征被普及化教条化以后形成的主流文艺批评风格之关系，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转化的过程和特点，这是个博大精深、又是异常艰难的研究课题，非一两部研究论著所能够穷尽。黄肇在本书中作了认真地探讨，我当然不能说她的研究已经非常透彻了，但这种知难而上的研究精神很值得赞扬。黄肇把 20 世纪 40—70 年代分作三个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和巩固，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中共理论指导的阶段，那时候毛语体基本上是以毛泽东个人思想魅力和语言魅力为标志的，以《讲话》为标志，毛语体为主导风格的文艺批评话语初步成型。从 20 世纪 50—60 年代上半期，毛语体逐步成为中共理论方针的主要表述形式，在文学艺术批评领域，由于毛泽东个人参与和思想的直接表达，其文体在文艺批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几次大的文艺批判运动，毛语体时代的文艺批评真正臻达话语的大一统。‘十七年’时期，以大批判式文体为主要形式，政治化文艺批评话语形成喷涌态势。”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语体时代发展到一个极致阶段，毛语体被“四人帮”利用来作为政治动乱的煽情工具，文艺批评也基本上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1976 年以后，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思想被诠释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毛语体作为一个过去了的历史文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黄肇的这一分类描述，基本上是把握了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黄肇在研究中采用了

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文本细读，她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以及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三个中共高级文件进行细读分析，深入分析了毛语体是怎样通过二十年的实践与演变，一步一步地朝着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在叙述毛语体时代的主流政治权力话语形成时，她也注意到知识分子话语是如何“被收编”的过程，对延安时期的丁玲、艾青、何其芳、刘白羽等人怎样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言朝着政治权力话语转化，都一一做了细致的探讨。这种关注细部关注文本的研究，都为最后解决这个课题做了必要的铺垫。

还有一点要指出：在目前，学术界透彻研究这个课题的客观条件似乎还没有完全成熟。文贵良在几年前研究战争期间的话语演变，他把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分别以三个人的名字为代表：毛泽东、胡风 and 赵树理，但是在出版社的审读和修改中，以毛泽东名字来命名的政治权力话语，被迫改为“革命话语”。这次黄擎在这部研究论著中又一次提出毛语体的时代，并且直面毛语体在历史上产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我认为要科学地把握20世纪40—70年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是不能回避毛泽东个人对这段历史的影响和作用的，正视这一点是一个研究者最起码的良知和道德。毛泽东已经去世三十多年，现在青年一代学者都是1970年以后出生的，他们根本不认识毛，与毛的时代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他们有条件能够比较客观、比较公正地研究那个过去了的历史文本，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来看待和分析历史遗留材料，能够比较科学地抛弃废话、套话和假话，来寻找历史的真相，对于过去的年代有可能作出符合现代人标准的研究结论和评价。如果今天对于三十年甚至更早以前的历史的科学研究仍然讳莫如深，深怀恐惧，多方审查和刁难，甚至企图掩耳盗铃式地自欺欺人，那只能说明，那个时代的阴魂仍然在今天徘徊，威胁着当代人们的和谐生活和正常工作，倒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为此，我赞扬文贵良、黄擎这样的一代青年学者，他们的研究或许还有各种弱点和不足，但是他们没有回避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敢于直面历史，直面错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传承知识分子的薪火；同时我也感谢支持他们出版学术著作的单

序



位和出版社，应该说，追求学术自由、科学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今天的重要使命，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2011年2月4日

于广州珠江之畔

前 言

近年来，学界对“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文化大革命’文学”研究也终于对巴金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倡导和邵燕祥建立“‘文革’学”的呼吁做出了迟到的回应，告别了反思的静默与研究的苍白。然而，与这些密切相关的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艺批评话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却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与重视，以毛泽东语体为考察视角，从批评话语切入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更是鲜见。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重要场所，20世纪40—70年代中国的主流文艺批评话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实践与文艺批评话语的复杂关系。那个时代的文艺批评话语及其影响下生成的文艺景观，虽然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离我们远去，但它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国民文化人格建构的深层影响至今仍有遗痕与回响，对当下文艺批评的良性发展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省思价值与借鉴意义。

钱理群在《一个亟待开发的“生荒地”》中对“20世纪40—70年代”界说时，特别指出其时间跨度其实是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钱理群把这一时间段称为“毛泽东时代”，他认为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全面领导地位，拉开了毛泽东时代的帷幕；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启，毛

泽东时代也离我们而去。^①高华就“毛泽东时代”的起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中提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有着内容和时间大致限定的概念，即毛泽东的思想统领和型塑社会面貌的时代，它所处的时间段应是自1949年到1976年”^②。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可以延伸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以前，因为我国1976—1978年的总体格局仍然延续了“毛泽东时代”最主要的特质。

本书所谓的“20世纪40—70年代”，时间起讫与钱理群对“20世纪40—70年代”的判定基本相同，即并非指局限于其字面所示的物理时间的跨度，而是指一个与在中国特殊政治、思想影响下生成的独特文学景观有关的文化时间的跨度，大体从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至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显在影响结束。但笔者认为这一时间段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毛泽东时代”，毕竟毛泽东的影响力初始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解放区和根据地，新中国成立之前对国统区和沦陷区虽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尚未臻达全面渗透的程度。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间段只是属于“准毛泽东时代”或“前毛泽东时代”。本书重点关注的虽然是毛泽东语体及其影响下的20世纪40—70年代的文艺批评话语，但由于历史的延续性，一些不在上述时间段内却对其文艺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文艺事件及相关文本仍将纳入本书的研究视野。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写作风格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钱理群、李陀等对“毛语言”、“毛文体”的特质及影响，陈思和对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等都进行了精辟的研究。然而，总体观之，从话语角度对20世纪40—70年代的文艺批评进行深入探究，并从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审视其对当代文艺批评实践与文学风貌影响的系统研究却比较少。作为“红色批评”的主导形式，

^① 参见钱理群《一个亟待开发的“生荒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② 高华：《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20 世纪 40—70 年代的文艺批评自有其社会政治批评的承传与异变轨迹，与传统文化和当下文化均有隐秘的血脉关联，具有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简单的否定或肯定都难以认识其复杂的理论风貌和实践功效。20 世纪 40—70 年代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也极为复杂，本书仅从毛语体的角度来探析其时主流文艺批评的话语特征。毛语体是毛泽东语体的简称，其含义有广狭之别。狭义的毛语体指毛泽东个人的语言体式；广义的毛语体则指以毛泽东的语体为代表的—个时代的最高权力体系话语。本书所谓的毛语体，除特别指出之外，均指广义的毛语体。

学界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语言体式风格的命名不同，有“毛语言”、“毛文体”、“毛泽东语体”、“毛语体”、“毛语”、“毛话语”、“毛氏话语”、“新华社语言”、“新华体”等不同提法，涵指则大同小异。钱理群在《论演戏——“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三》里曾用过“毛语言”、“毛文体”的说法。他认为，“毛语言”“不仅是毛泽东本人著作中的语言，指的是以毛泽东著作为范例的一种语言模式”^①。钱理群提出“毛语言”有相当的“策论”成分，并以 20 世纪 60 年代中共和苏共、东欧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的文章为例，分析这种“广场上的表演艺术”所具有的“策论”特点。钱理群认为，“毛文体”是一个难以用简单的肯定否定或者用简单的是非说得清楚的非常复杂的文体，它“还在深刻地控制着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很多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仍然受到“毛文体”的影响^②。李陀在《雪崩何处》（余华中短篇小说集《偶然事件》代序，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现代汉语与当代文学》（《新地文学》1991 年第 1 卷第 6 期）、《转述与毛文体的产生》（《文化中国》1994 年 9 月号）、《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 年第 5 期）、《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 年第 7 期）等文中多数时候用的是“毛文体”，也有几处用的是“毛话语”。李陀认为，一种话语在激烈的话语斗争中能够排斥其他的

①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1 页。

② 同上书，第 222、227 页。

话语而最终取得霸权地位，是“由许多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多种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在互相冲突又互相制约中最终形成的结果”，他认为“毛文体”较之其他话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在于，“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的中国现代性话语”^①。李锐在《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再谈语言自觉的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中用的也是“毛文体”，他指出“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毛文体”“再一次为中国人丈量了自己的深渊”，“神化大众和反智主义这两面狰狞的旗帜，终于借着‘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膨胀，走上了现代汉语的最高峰。”傅金祥在《毛泽东语体与现代汉语写作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用的是“毛泽东语体”，指的是毛泽东的语言以其独特的个性风格形成了鲜明的体式。他认为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写作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毛泽东的文章和语言在现代汉语写作发展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萧开愚在《灵魂有待长大的南方诗歌》（《南方都市报》2002年7月24日）中用的是“毛语体”和“新华体”，他认为“‘普通话’写作很容易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话语态势，南方口语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要弱一些”，而“口语写作”是对“毛语体”和“新华体”的颠覆。李劫在《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语言革命与语言复辟》、朱大可在《当代散文的命运》、杨小滨在《中国先锋文学与“毛语”的创伤》等文中用的则是“毛语”。文贵良在其博士论文《危机与新生——战争年代（1937—1948）的文学话语转型》中用的是“毛氏话语”，他认为“毛氏话语”是成熟的政论白话文和以毛泽东命名的话语权威的结合，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高华的《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多数时候用“毛泽东的革命话语”，偶尔则用“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新话语”。高华认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

① 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